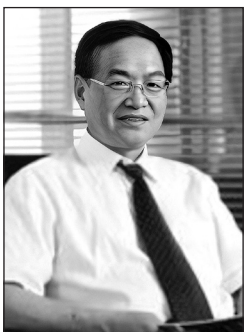


栉风沐雨 行远自迩

○周海梦（1970届工化）



周海梦
学长

1965年的金秋时节，当我踏入美丽的清华园时，未曾想到就此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一辈子的清华人。

从最初进入工程化学系学习，1970年毕业留校在化工系高分子教研组工作，成为一名清华园的“新工人”，走上了与清华相伴的人生之路。一路走来，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从转向生命科学领域开展教学科研，到被学校外派组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在时光荏苒中回望，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代的变迁和进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有着58年校龄的清华人，我也践行了一条与时代共命运、与学校共脉搏的奋进之路。

清华园的“新工人”——启程之路

毕业留校后，根据工作需要，我听从组织的安排频繁地调动工作岗位。先是参加了校办工厂聚碳酸酯车间的建设，聚碳酸酯是当时国家急需的一种工程塑料，是由双酚A和光气缩合而成的高分子材料。

我参与了合成的小试至大车间生产的全过程，那时的 work 情景还历历在目。时值夏天，身上的工作服被汗水湿透，不久就白花花一片。虽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还冒着试制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毒气泄漏的危险，但胸怀报效祖国的信念，也体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情壮志。后来也曾以“新工人”身份参加过高能电池组三结合攻关小组。攻关小组隶属于基础课委员会化学教研组领导，组长孟祥发，有钱伟长（力学教授）、童诗白（电子学教授）、宋镜瀛（汽车教授）和徐日新（化学教授）四大教授参加。在参与研制锌-空气高能电池的一年多的工作期间，我有幸向四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近距离学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严谨治学的风范，特别是钱伟长先生忘我工作的敬业精神让我终生难忘。要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老先生们承受着巨大的多重压力，但为了填补国家的科技空白，哪怕再苦再累都无所畏惧，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1974年，我担任了化工系高分子专业1974级分41班的班主任和分4年级的级主任，教师和学生组成教改小分队，我们戏称“小分队办大学”，实行“开门办学”，与学生们一起在天津塘沽的大沽化工厂摸爬滚打，在海河边上度过了春夏秋冬。也曾参加过开赴唐山开平化工厂的抗震救灾队伍，目睹了唐山大地震后的惨景和军民同心救灾的震撼场面，身临其境，

着实锻炼了自己。回来后继续担任我的分41班班主任，直至1978年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工作。时间过去四十多年，分41班学生还一个个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走过了我的青春之路。

从化学工程到生命科学——转向之路

1978年10月我开始读研，当时学校领导层已经在考虑恢复生物系、恢复理学院了，时任副校长滕藤教授与我的导师方一梅教授商量，送我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去学习，师从邹承鲁先生，从化学工程转向生物学领域，攻读生物化学硕士学位。现在回想起来，仍深感荣幸，感恩目光长远的老师们，为我选择了一条充满生机的发展之路。1981年硕士毕业后又工作了两年，参与了由周昕教授主持的化工系生物化学研究室的建设与工作，地址在气象台。我们几个“新工人”青年教师带领几名学生将沉重的高速冷冻离心机、LKB层析仪，靠着人抬肩扛搬上了气象台。

1984年生物系恢复，我被调入生物系工作。同年我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继续师从邹承鲁教授，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邹先生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尤其是对待科学论文写作的严谨治学态度深深影响了我，也影响着我的一代又一代学生。1986年我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Bert L. Vallee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出国后发现当时国外实验条件与国内有着天壤之别，这深深刺激了我，回国时我通过海运带回了七大箱实验器材和书籍，希望为回国后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能够做出成绩报效国家。



1987年在美国留学时，周海梦（右）与导师邹承鲁、李林夫妇在哈佛医学院留影

1988年我回国继续在生物系工作，基本完成从化学工程向生命科学的转向。

难忘的生物系——奔腾之路

我回校后受到了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亲切关怀。赵南明教授给我介绍了系里两年来的发展。我从三十六所（已拆除，位于今艺教中心）离开，又回到了三十六所，然而马上就要搬进改造后的老生物馆，这预示着生物系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我们生物系的“新工人”属系里一群最年轻的教授，在生物系复系初期，条件非常艰苦，师资力量十分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南明教授为代表的系领导目光放得很远，毅然把我们一批“新工人”送出国学习深造。1988年前后，这群人陆续回国，为生物系注入活力，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样“成批放飞，全部收回”的现象实属少见。

系里交给我两项任务，第一，立即为生6班（1986年入学的）学生讲授生物化学课，没有给我准备期，边备课边讲课，教材用Lehninger的*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用双语教学。这门课不久被评为学校一类课程。十多年后，我领衔

翻译了Lehninger的第三版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优秀生命科学教材译丛”的《Lehninger生物化学原理（第三版）》（中文版），受到了广泛好评。第二个是让我负责申报生物化学硕士点。当时我了解到1987年学科申报时我系生物物理学学科点获批了博士学位授予点，而生物化学连硕士点都没有获批。因此系领导十分着急，希望我们在1989年审批时务必拿下硕士点。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两项任务。经过努力，我们如期拿下生物化学硕士点，而后在90年代又拿下博士点，使得我们系拥有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为后来转为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实验室建设方面，1988年搬入老生物学馆，系里给了我25m²的实验室，当时条件下已属很好了。同年申请获批一项国家教委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7万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少的基金，而后我又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1项。1988年招录了第一名研究生，接受生物系首届1985级学生2名入实验室做毕业论文，同时吸引1986级、1987级学生4名提前进入实验室，这样就组建起了研究团队。那时期我们科研热情极高，成天泡在实验室，几乎放弃所有周末和节假日，工作近乎“疯狂”。我从那时起，主要开展了酶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包括酶的化学修饰、酶的催化动力学、酶结构改变对生物活性的影响等，集中于酶的活性部位柔性的研究，其后参加了“蛋白质折叠研究”的国家攀登计划项目以及后来的“863”和“973”等多项科研项目，做出了一定成绩，后来还出版了《蛋白质化学修饰》《酶活性部位的柔性》等专著。同时，实验室拥有浓厚

的科研氛围，为学生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研究空间，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他们如今在生命科学的不同研究领域都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990年我晋升为正教授。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劳动人事部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1992年获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老系主任赵南明教授再次出山，二度担任系主任，我有幸担任副系主任。那段时期，他担任着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务，同时他有意识地想培养我的领导能力，给我压担子，这为我在1999年承担系主任工作奠定了基础。在我任副系主任到系主任的九年时间里正逢“211工程”验收、“985项目”建设的关键时期，1999年学校一期985学科建设在经费上给了生物系一个巨大的投入，我们抓住机遇，经全系教职员工的努力，在人才引进、学科建设、科研工作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跨越式快速发展，科研成果频出，初步建设了生物系实验教学中心，并能顺利通过北京市基础教学实验室的评估，为建设北京市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奠定了基础。理科基础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基地。系主任的工作锻炼了我的能力，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教学科研方面也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后来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生物学评议组），教育部生物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生物工程与生物技术分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973计划领域专家咨询组成员（健康科学领域），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酶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履行了应有

的义务和责任。

在生物系多年工作中，我深深意识到，历届系（院）领导有一个共同的遗传基因，这就是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全力引进优秀人才。通过一系列举措和规划，生物系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海外学子陆续加盟，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和良好的教学科研氛围，由此也取得了科研项目、经费和论文等方面的多项突破，科研水平不断提升。2002年10月，我结束生物系主任任期，调任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光召先生）。

从北京到浙江——发展之路

2003年7月，我在国家会计学院参加学校的暑期干部会，晚上在院内散步时，迎面遇到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和副校长岑章志，两位校领导立即叫住我，开门见山就说，学校拟在浙江建立一个“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打算让你去担任院长。我的脑子“轰”地一声，心想你们弄错了，我能胜任这工作吗？我立即想到深圳研究院，想到了院长老冯。我和冯冠平是好朋友，在担任生物系主任时常去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和交流，路过深圳时常去看看冯院长。我到过他们初创时的铁皮房，到过他们大楼的建设工地，我真佩服他们艰苦创业的劲头。老冯他担任过科技处处长，在这方面有强大能力啊，而我一直是从事基础研究，没有离开过实验室小天地，确实没有能力去担此重任啊！

我回校后，找到考察选址的相关同志及拟任副院长的陈吕军（他也是考察组的成员）等同志了解情况，才知道此项工作的重要性。2003年3月17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率团访问清华大学共商省校合作机制，拟决定建立一个研究院，接着学校派出了一个考察选址小组，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决定选址嘉兴建院。这是一个以清华大学科技、人才为依托，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服务、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展工作的，为更好地发挥清华大学服务社会职能，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定名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经过慎重考虑，我最终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出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

2003年12月31日在杭州黄龙饭店，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举行共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签约仪式，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和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同志出席了仪式。我被任命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并于2004年2月9日，带领包括我在内的一共九人，入住嘉兴宾馆开始研究院创建工作。

万事开头难。成立之初的研究院别说科技创新平台，就连固定的办公场所、实验设备也没有，不少专业性人才也奇缺。因此采取边筹备边运作的方式，哪个领域的条件成熟，就先建立哪个研究所。2004年7月，研究院在集成光学方面，具备了优秀的科研人员、实验室场地，还获得了浙江、江苏、上海二省一市的科技攻关项目，由此集成光学研究所成为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成立的首个研究所（这个所后改名为先进制造研究所），利用浙江及长三角地区的光电产业集群优势和清华大学科研优势资源，整合产、学、研、资等各种资

源力量。

2007年6月15日《浙江日报》的报道这样写着：“作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带头人，周海梦对研究院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说，自主创新关键在人才，浙江要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研究院还与杭州、温州、嘉兴等地的相关企业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随着一大批高层次人才被吸引到清华研究院，研究院总部5.5万平方米的创新大厦的建成，生物技术和医药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所、先进制造研究所、信息技术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并在各个领域不断实践创新，在科技创新日益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之际，将科技研发与地方实际需求相结合，全力开展科技攻关，对既具市场前景又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科技项目，特别是生物医药、生态环境保护、先进制造、电子信息和建筑节能等领域的研发都取得了较大进展。2009年8月，我卸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职务，继续担任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胡海峰同志担任第二任院长。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建设，在以往基础上总结出了“政产学研经介用”的“北斗七星论”的发展模式，研究院得到快速发展。“一棵树，随着枝叶的繁茂，撑起的那片天空随之扩大延伸。位于嘉兴科技城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也犹如大树般，随着一个个科技创新平台的涌现，枝叶不断外延，编织了一个科技创新大平台，依托清华，立足浙江，服务长三角。”（摘自《嘉兴日报》2009年4月1日报道）

建院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4年5月在浙江省委、清华大学党委《关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发展情况的汇报》上作出批示，极大地鼓舞了研究院的全体员工，怀着绝不辜负总书记殷切期望的信念，在第三任院长王涛的领导下全面完成研究院建设计划。在300亩的院区中，33万平方米的高楼耸立，建成了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级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多个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看着这蓬勃发展的研究院，我思绪万千。作为研究院首任院长，我当初肩负重任从清华来到浙江，在省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率领研究院从无到有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努力发挥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科技和人才优势，为推进产学研合作，助力地方产业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区域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在浙江工作期间，我始终不



2005年4月10日，省校领导共同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总部大楼奠基

忘教书育人的初心，清华生命科学馆里我的实验室继续在运行，争取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工作、培养研究生一直没有停止，直至2012年退休。2006年我获教育部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我到浙江工作后，2005年入选首批浙江省特级专家，延长了我在浙江的学术生涯，期间兼任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为地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17年3月我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退休。秉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理念，多年来我辛勤耕耘，迄今先后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进修教师等百余人，为

他们的教学科研发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人生漫漫路，峥嵘岁月稠。而今迈步从头越，更要以旷达的心境，充实自我，去追求新的人生境界。现在我默默地关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发展，默默地关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发展，默默地关注着我培养的弟子的发展，老有所为，做一些自己想做又力所能及的事情。徜徉在兰馨书香的清华园，目睹着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怀着身为清华人的自豪与荣耀，满怀希望地期待，未来的路上水木清华将更加璀璨辉煌！

“地雷班”往事

○谢世钟（1970届无线电）



谢世钟学长

前几年在我们毕业50年时，班上向大家征集文章，作为大学时代在特殊时期度过的一员，我想起了当年“地雷班”的一段往事。

记得1964年大一开学不久，大家在忙于课内学习的同时，还想方设法加入各种课外文体社团。这些社团种类之多、水平之高是中学时代不可比拟的，宿舍里大家常聊些社团的情况并约着一起去报名。在

当时社会氛围下军体运动很吸引人，我报过摩托车队，还参加了骑自行车“绕杆儿”和“定车”考试，自我感觉不错但还是没取上。好在没过多久就有了好消息，一天，我被通知到校武装部开会，讨论参加地雷班的事。那时，电影《地雷战》看过好几遍了，所以我想这还用讨论，肯定是参加啊。等开了会才知道，这个班是新成立的，将研制无线引爆的遥控地雷，而不是像电影里那样装炸药、埋地雷、拉绳子引爆。这下我也明白为什么自己被招进这个班了，应该是跟高中时参加北京市少年宫无线电组、装过五灯收音机有关吧。

地雷班上五六个成员清一色都是我们系同年级男生，估计也都有无线电制作的基础。几位外班同学的姓名因年代久远，已记不确切了。确切记得的是我们班就钱乐军和我两人，带队的是系里李普成和肖